

两汉思想史

第三卷

Lianghan Sixiangshi

徐复观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两汉思想史

徐复观 著 第三卷

Lianghan Sixiang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思想史/徐复观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2
ISBN 7-5617-2816-6

I. 两... II. 徐... III. 思想史-中国-汉代
IV. B23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436 号

两汉思想史(第一~三卷)

著 者 徐复观
特邀编辑 陈克艰 秦 榛
责任编辑 陈丽菲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 //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省扬中市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68.125
字 数 109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3 100
标准书号 ISBN 7-5617-2816-6/K·216
定 价 98.00 元(套)

出 版 人 朱杰人

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 代序

兹当《两汉思想史》卷三刊行之际,对自己年来在思想史中所下的考据工夫,应作一解说,因为有朋友曾向我提到此一问题。

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实质上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我既无现实权势,也无学术地位,只有站在学术的坚强立足点上说出我的意见,才能支持我良心上的要求,接受历史时间的考验。考据不是以态度对态度,而是以证据对证据。这是取得坚强立足点的第一步,也是脱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混乱之局的第一步。

一谈到考据,大家会立刻联想到乾嘉学派。以考据为专门之学,的确是出自乾嘉学派。但他们在以汉学打宋学的自设陷阱中,不仅不了解宋学,且亦不了解汉学。更糟的是,他们因反宋学太过,结果反对了学术中的思想,既失掉考据应有的指归,也失掉考据历程中重要的凭借,使考据成为发挥主观意气的工具。这在本书附录上的《“清代汉学”衡论》中已有较详实的陈述。其中在训诂校勘上卓有成就的,又都短钉零碎,距离思想的层次很远。此种风气,为现代学人所传承,更向古典真伪问题上发展,应当是好现象。但发生影响最大的“古史辨”派,卤莽灭裂,更从文献上增加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困扰。要从这种困扰中解脱出来,重新奠定学术工作起步的基础,只能出之以更谨慎更精密的考据,破除他们肤浅粗疏甚至是虚伪的考据。否则他们会斥抱有不同意见的人是“游谈无根”,因而加以抹煞、讪笑。

乾嘉学派,一直到今天还是一股有力的风气。我留心到,治中国哲学的

人,因为不曾在考据上用过一番工夫,遇到考据上已经提出的问题,必然会顺随时风众势,作自己立说的缘饰。例如熊师十力,以推倒一时豪杰的气概,在中国学问上自辟新境。但他瞧不起乾嘉学派,而在骨子里又佩服乾嘉学派,所以他从来不从正面撷此派之锋,而在历史上文献上常提出悬空地想像以作自己立论的根据,成为他著作中最显著的病累。其他因乘风借势,而颠倒中国思想发展之绪的,何可胜数。所以我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起,考据工作,首先指向古典真伪问题之上。

二

关于两汉思想,现时一般的说法: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是不可信赖的文献;《说苑》则系成书于刘向之前,并非刘向所著。诸如此类,我若不自己下一番考据工夫,要便是把这些著作,从两汉思想中,武断地加以剔除;要便是不考虑异同之见,我行我素地加以阐述。这都不是真正负责的态度。自己下过一番工夫后,凡是他人证据上可以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接受,用不着立异。凡是他人证据上不能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抛弃,无所谓权威。我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作了这种程度不同的努力。对较有关键性的一词一语,一事一物,亦必探索其来源,较量其时代。未曾无批判地接受过传统的说法,也未曾无批判地否定过时人的说法。在证据的打擂台所得出的结论,这才是可资信赖的结论。若由后起的坚强证据将已得出的结论推翻,这是学术上的进步,我由衷地期待这种进步。

三

在治思想史中言考据,必然地向另外三个层面扩展。一是知人论世的层面。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我深深体悟到,解释和解释者的人格,常密切相关,这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必一一举例。由此可以断言,古人的思想,必然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世、遭遇等,有密切关系。我更深深体悟到,在二十余年的工作中,证明了克罗齐(Croce, 一八六六——一九五二年)“只有现代史”的说法。没有五十年代台湾反中国文化的压力,没有六十年代大陆反孔反儒的压力,我可能便找不到了

解古人思想的钥匙,甚至我不会作这种艰辛的尝试。江青辈以《盐铁论》为儒家斗争的样版,郭沫若、冯友兰也加入在里面,由厚诬贤良文学以厚诬孔子、儒家,我便在他们的声势烜赫中,写了《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彻底解答了此一公案。这是最突出的例子。由此可以断言,古人思想的形成,必然与古人所遭遇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上面两种关系,总是纠缠在一起,把这种关系考据清楚,是解释工作的第一步。我每篇文章中,都走了这样的第一步,却走得并不够。

其次,是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变之迹的层面。不仅思想的内容,都由发展演变而来;内容表现的方式,有时也有发展演变之迹可考。只有能把握到这种发展演变,才能尽到思想史之所谓“史”的责任,才能为每种思想作出公平正确的“定位”。我每篇文章中,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显然的。这是一种考据,也是考据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第三是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的层面。在此一层面中,首先须细读全书,这便把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概括在里面。我不信任没有细读全书所作的抽样工作,更痛恨断章取义、信口雌黄的时代风气。仔细读完一部书,加以条理,加以分析,加以摘抄,加以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尚且不一定能把握得周到、真切,则随便抽几句话来作演绎的前提,尽量演绎下去,这只能表现个人思辨之功,大概不能算是为学术做了奠基工作。我最多的工夫,常常是花费在这一层面上,这是古人所易,却为今人所难的。虽然如此,我的著作,便可全资信赖吗?决不敢这样讲。所以我总是希望读者能由我的文章引起亲读原典的兴趣。但要得到可信赖的结论,我所提出的考据工作总是值得参考的。

目 录

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 代序	1
《韩诗外传》的研究	1
一、中国思想表达的另一方式	1
二、韩婴及诗教与诗传的问题	4
三、由《韩诗传》考查各家诗说的根源	7
四、《韩诗传》所关涉到的其他典籍	12
五、《韩诗传》中的基本思想及其与诸家的关涉	14
六、《韩诗传》中突出的问题	20
(1) 士的问题的突出	20
(2) “士节”的强调	22
(3) 养亲及君亲间的矛盾	24
(4) 妇女地位的被重视	27
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	31
一、刘向的家世、时代与生平	31
二、《新序》、《说苑》的问题	39
三、《新序》、《说苑》与《韩诗传》	43
四、与其他典籍之关连	48
五、刘向的政治思想	57
(1) 针对现实政治的一方面	57
(2) 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一方面	62
六、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	64

《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	73
一、背景	73
二、辩论的历程、态度及所反映出的社会地位	77
三、盐铁专卖政策的形成	82
四、两方的政治原则问题	85
五、现实上的利害比较	88
六、边疆政策的歧见	95
七、辩论中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	104
八、文化背景问题	115
 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	132
一、有关字形正误	132
二、由史的原始职务以释史字的原形原义	134
三、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	136
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织与交融	141
五、古代史官的突出人物	144
六、孔子的学问与史的关系	149
七、孔子修《春秋》的意义	151
八、孔子学问的性格及对史学的贡献	157
九、《春秋左氏传》若干纠葛的澄清	159
十、左氏“以史传经”的重大意义与成就	164
十一、从史学观点评估《左氏传》	167
十二、左氏晚年作《国语》，乃所以补《左氏传》所受的限制	177
 论《史记》	185
一、前言	185
二、《太史公行年考》的补正	186
三、史公的家世、时代与思想	190
四、史公的史学精神及其作史的目的	195
五、《史记》构造之一——本纪、世家	204
六、《史记》构造之二——表	211

七、《史记》构造之三——书及其中的存缺问题	216
八、《史记》构造之四——列传中的若干问题	230
九、《史记》构造之五——立传的选择	235
十、《史记》构造之六——表现方法上的若干特点	246
 读《〈论史记〉驳议》——敬答施之勉先生	266
《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276
一、问题的回顾	276
二、班氏父子的家世、思想及其著书的目的	284
三、班氏父子对《史记》的批评	287
四、《汉书》之成立历程	291
五、《史》、《汉》比较之一——纪	293
六、《史》、《汉》比较之二——表	300
七、《史》、《汉》比较之三——书、志	305
八、《史》、《汉》比较之四——传	314
九、《史》、《汉》比较之五——文字的比较	322
 附录一 帛书《老子》所反映出的若干问题	332
附录二 “清代汉学”衡论	340



《韩诗外传》的研究

一、中国思想表达的另一方式

由先秦以及西汉,思想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论语》、《老子》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赋予概念性的说明。这是最常见的诸子百家所用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春秋》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这是诸子百家用作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

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可以说至孟子而大明。《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行褒贬于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代替礼废乐坏后的周天子的赏罚,想以此来建立人类行为的大标准,所以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是就孔子担当人类历史命运的大纲维来说的。《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就孔子把自己的思想(义),具体化于历史判断之中,使一般人能易于领受来说的。孟子的两段话,其意义本互相贯通;但后者更扩散而给诸子百家以广大的影响。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仲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司马迁《史记·自序》对此加以引述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

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载之“空言”,是把自己的思想,诉之于概念性抽象性的语言。用近代的术语,这是哲学家的语言。“见之于行事”,是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具体的前言往行的重现,使读者由此种重现以反省其意义与是非得失。用近代术语说,这是史学家的语言。哲学家的语言,是把自己的思想,凭抽象的概念,构成一种理论,直接加之于读者的身上;读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力,始可与哲学家的理论相应。而相应以后,由理论落实到行为上,还有一段距离。历史家的语言,则是凭具体的历史故事,以说向具体的人。此时读者不是直接听取作者的理论,而是具体的人与具体的人直接接触,读者可凭直感而不须凭思考之力,即可加以领受。并且,此时的领受,是由“历史人”的言行,直接与“现存人”的言行,两相照应,对读者可当下发生直接作用。也可以说,这是由古人行为的成效以显示人类行为的规范,不须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准,便可以领受得到的。一部伟大的小说所发生的社会性的影响,必大于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因为哲学著作是“空言”,而小说则诉之于小说家所塑造的具像化的人物的“行事”。由此可以了解董氏所说的孔子用春秋这一方式所显示的意义。卡西拉(E. Cassirer,一八七四年七月二八日——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在他所著的《人论》(An Essay on Man)第十章《历史》,以下面的一段话作结:

没有历史,我们便看不出在此有机体的进化中的根本的连结。

艺术与历史,为我们探求人性的最有力的工具。若没有这两种知识的源泉,我们对于人会知道什么呢?……我们可以作心理学的实验,或搜集统计的事实。然而由这些客观方法所得的人间像,常常是无力的,没有色彩的;我们仅能看出“平均地”人间,作日常实际活动及社会交涉的人间。在历史及艺术的伟大业绩里面,我们才能在习惯性地人间的假面背后,看出真正的人格的人间之姿……诗不是描写单纯的自然;历史不是死的事实或事件的故事。历史与诗,同样是我们了解自己的研究方法,为了作成人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工具。^①

两千多年后卡西拉所说的话,可以与两千多年前董氏所说的孔子作《春秋》的意义,互相印证。

孔子以作《春秋》的方式,表达他对人类的理想、要求以后,到战国中期以后的诸子百家,发生了重大影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起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孔子据鲁《史记》以作《春秋》,因年月首尾完具,除“取其义”外,更有史学的重大意义。上述诸人“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乃偏在“取其义”的方面,不一定有史学的意义。《孟子》采用此种方式不多;《荀子》采用此一方式的比率,则较《孟子》为重。尤其是疑成于荀卿弟子之手的《大略》、《宥坐》等六篇,更为《韩诗外传》所承继。

以抽象性的语言表达思想,其语言可以概括的范围较大,其中的夹杂性较少,因而富有条贯性与明确性。所谓“理论”、“原理”、“原则”,即由此种语言所构成。所以即使以《春秋》的方式表达思想,亦不能排除抽象性的语言。《公羊传》、《穀梁传》,即是借助于此种语言以释明“行事”所含的意义。《韩非子》在《解老篇》以前,抽象性的语言重于故事。自《喻老篇》起,则故事重于抽象性的语言。《说林》上下,则全由故事所构成。而《内储》、《外储》,则有计划地以简单的抽象语言,提挈后面的故事;以后面的故事,证明前面抽象的语言。大约成书与《韩非子》相先后的《晏子春秋》,则主要由晏子的故事以构成全书的结构。《吕氏春秋·十二纪》,除《纪首》外,每纪安排有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前两篇,以理论的陈述为主,而以历史故事,为理论的证明。但在第三第四篇,则历史故事的成分比重加大。《八览》、《六论》,则几乎是以历史故事为主。一个人,想把自己的体验与观察构成理论,必须经过抽象思辨的历程,始能用语

言表达出来。但由周初所开始的人文精神,认为人的行为决定一切,所以偏重在行为实践上用心,不向抽象思辨方面去发展。古典中,凡是言与行对举时,总是重行而压低言在人生中的意味,这在《论语》中最为明显。所以在以抽象言语表达思想时,也不像希腊系统的哲人样,穷思辨之所至,以构成理论的格局。但此种格局愈高大愈深邃,其离具体的人生、社会也愈远。中国在这方面,有如《荀子》、《吕氏春秋》等,则使抽象语言与具体事例,取得均衡的地位,而不让其偏向抽象思辨的方面发展。《韩非子·解老篇》,以抽象的语言解释《老子》的思想内容;《喻老篇》,则以具体的事例晓喻《老子》思想的功用。《淮南子》多以抽象而又带有描绘性的语言阐明《老子》之所谓道,但在《道应训》中则以具体的事例陈述道的应验,这恐受有韩非的影响。所有这些以故事为主的著作体裁,与起于南北朝时代的汇书的性质不同,汇书只是按类抄录,以为写文章时铺辞摘藻之资,在抄录的后面,没有思想性的活动。而先秦的这种体裁,乃是想加强思想在现实上的功用性与通俗性,尤其是想加强对统治集团的说服力。西汉著作,除扬雄的《太玄》、《法言》^②外,几无一不受此种体裁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韩婴的《韩诗外传》^③。而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则又是承《韩诗外传》之风而兴起的。

二、韩婴及诗教与诗传的问题

《汉书·儒林传》: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惟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常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微,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

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中尉,自有传。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

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发福,皆至大官,徒众尤盛。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下录有《韩氏》二篇(亡)。《诗》下录有《韩故》三十六卷(亡),《韩内传》四卷(亡),《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亡)。按班氏序,谓:“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据此,则韩婴所著者仅有《内外传》。《韩故》、《韩说》,殆皆其孙韩商为博士时所集录。韩婴在文帝时为博士,鲁申公与楚元王之子郢,在吕后时同事浮丘伯;而辕固生在景帝时为博士,是韩的年辈,在鲁申公齐辕固生之上,而与荀卿弟子浮丘伯的年辈相先后。他在《外传》中共引用《荀子》凡五十四次,其深受荀子影响,可无疑问。即《外传》表达的形式,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亦由《荀子》发展而来。由春秋贤士大夫的赋诗言志,以及由《论语》所见之诗教,可以了解所谓“兴于诗”^④的兴,乃由《诗》所蕴蓄之感情的感发,而将《诗》由原有的意味,引申成为象征性的意味。象征的意味,是由原有的意味,扩散浮升而成为另一精神境界。此时《诗》的意味,便较原有的意味为广为高为灵活,可自由进入到领受者的精神领域,而与其当下的情景相应。尽管当下的情景与《诗》中的情景,有很大的距离。此时《诗》已突破了字句训诂的拘束,反射出领受者的心情,以代替了由训诂而来的意味。试就《论语》孔子许子贡、子夏可与言诗的地方加以体悟^⑤,应即可以了然于人受到《诗》的感发的同时,《诗》即成为象征意味之诗的所谓“诗教”。此时的象征意味与原有的意味的关连,成为若有若无的状态,甚至与之不甚相干。

历史的特性,是一个人,一件事,决不会再度呈现。由此可以了解,孔子作《春秋》以为百世法,此时《春秋》中人物的言行,亦必破除其特定的时间空间与具体人物个性的限制,而把其中所蕴含的人的本质与事的基义,呈现出来,使其保有某种的普遍性妥当性。于是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此时亦成为此普遍性与妥当性的一种象征。此虽较诗的象征为质实,但在领受者的精神领域中,都是以其象征的意味而发生作用,则是一致的。这样便开了由荀子到《韩诗外传》的诗与史相结合的表现方式。

《荀子·劝学篇》第一的头三段,皆引《诗》作结;第四段则以《诗》作结时,

在诗后加一句“此之谓也”。此后大体上成为荀子引《诗》的格式。《修身篇》用此格式者三,《不苟篇》三引《诗》,其中用上述格式者二。此后各篇,或多或少,率有此种引《诗》的格式。此格式的意义,认为他所说的道理及所引的故事,皆为他所引的两句或四句《诗》所涵摄,此时诗的意味的象征化,自不待论。到了《韩诗外传》,未引《诗》作结者仅二十八处^⑥;而此二十八处,可推定为文字的残缺。其引《诗》作结时,也多援用荀子所用的格式。西汉附丽于经之所谓传,皆所以发明经的微言大义。由此可以了解,《韩诗外传》,乃韩婴以前言往行的故事,发明《诗》的微言大义之书。此时《诗》与故事的结合,皆是象征层次上的结合。《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谓“赋诗断章”,郑康成谓诗有正义,有旁义。断章,旁义,以今语表达,即是诗的象征的意义。《汉志》谓“咸非其本义”,韩氏乃直承孔门“诗教”,并不否定其本义,但不仅在本义上说诗,使诗发挥更大的教育意义。《汉志》带批评性的话,对韩氏乃至对齐辕固生而言,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鲁申公未为诗作传,而仅为之作故训,则就诗的文义以言诗,所以“惟鲁为近之”;这都是由用心的不同,而立言因之异体,无关于三家的得失。

问题是,在《汉志》的《韩诗内传》四卷,《隋书·经籍志》已未见著录;而《汉志》上的《外传》六卷,在《隋志》则成为十卷;虽流传唐宋间,字句不免有残缺,但今日仍能看到十卷的面貌。而《内传》四卷亡佚,早成定论。于是自王应麟起,不少人作了辑佚的工作。但近人杨树达氏,则以为《内传》已附合于《外传》,并未曾亡佚。他在所著《汉书窥管·艺文志》第十中谓“愚谓《内传》四卷,实在今本《外传》之中。班志《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其合数恰与今本十卷相合。今本《外传》第五卷首章为‘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云云,此实为原本《外传》首卷之首章。盖内外传同是依经推演之词,故后为人合并,而犹留此痕迹耳。《隋志》有《外传》十卷而无《内传》,知其合并隋以前矣。近人辑韩诗者皆以训诂之文为《内传》,意谓内外传当有别,不知彼乃《韩故》之文,非《内传》文也”。按《韩非子》之《内储说》、《外储说》,及《晏子春秋》之《内篇》、《外篇》,在性质与形式上,并无分别。以意推之,或者先成的部分,称之为内;补写的部分,便称之为外。所谓内外者,不过仅指写成的先后次序而言。据《儒林传》“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的话加以推测,《韩诗》内外传,在性质上完全相同。且就今日十卷的字数合计,约五万字左右,也与“数万言”者相合。前四卷共引《荀子》者三十一;后六卷共引《荀子》者二十三,或者可由此

推证他在先写前四卷时,受《荀子》的影响较大;而补写后六卷时,因学问的增益,受《荀子》的影响较小。综合地看,杨氏谓内传在隋以前合并于外传之中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惟他以卷五首言《关雎》,以作此是原外传首卷之证,则不必如此拘泥;盖卷一乃首引《召南·采芣》;而全书引《诗》,并未按《诗》的先后次序。内外传合并后,应正名为《韩诗传》;编《隋志》的人,只援用未合并以前《汉志》名称之一,遂引起不少误解。本文后面,即概称为《韩诗传》。

三、由《韩诗传》考查各家诗说的根源

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可尽信”条:“《史记》载三家,以申培、轅固、韩婴为初祖;而三家传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详。三家所以各成一家,异同亦无可考。”按镂板盛行以后,同一典籍,在版本上尚有异同。由此可以推知,在先秦以逮汉初,典籍因传抄的分布流传,而文字上有所出入,有如帛书《老子》甲本乙本的情形,乃意料中事。至于训诂上的不一致,即五经博士成立以后,同说一经,博士间亦不能无异说。所以三家诗在传本上文字训诂的小有异同,决不能成为分门立户,各成一家的根据。皮氏论《诗经》,主要在说明三家诗皆有诗序,而诗序“同出一原”,其论证皆可成立。惟其用意则在联合三家为同一阵线,以加强对《毛诗》的贬抑,则出自清代今文家的成见陋见,此处不必辩难。这里所要首先指出的是,在《韩诗传》中,韩氏也有就诗的本义以言诗义的。以象征意义言诗,各家可以不同;就本义以言诗,鲁、齐、韩、毛四家,并无可以分门立户的畛域。《韩诗传》卷一:

传曰: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诗》曰:难速我讼,亦不尔从。

按此处对《召南·行露》诗的解释,与刘向《列女传》四“召南申女”条,文字有详略之不同(《韩传》略而《列女传》详),但内容则完全一致。而韩氏此处先用“传曰”,以见此种解释,系本于先已存在的诗传。此诗传刘向尚能看到,所以抄录得较韩氏为详细。《列女传》:“《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

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故举而扬之，传而法之，以绝无理之求，防淫欲之行焉。又曰：‘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之谓也。”此处的“《召南》申女”，不可能是刘向随意加上去的，当为韩氏所引的“传曰”所固有；特韩氏引用时加以删节，此乃汉人引书常例。一般人认为刘向习《鲁诗》。《鲁诗》之名，起于申公，申公年辈后于韩氏；且鲁诗有“故”而无传，乃《儒林传》所明言，《艺文志》所录者可以互证。是刘向所习的《鲁诗》，与《韩传》乃同一来源。因此，我推测，先秦本有一叙述诗本事并发挥其大义之“传”，为汉初诸家所共同祖述，而不应强分属于某一家。《毛诗·小序》：“《行露》，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小序》以此诗为“召伯听讼”，盖承顺上面《甘棠》一诗而言；毛传更因此认为“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时”，这是都不可信的。但对诗内容的解释，与韩氏所引“传曰”，则并无不同。意者《诗序》与三家所本者，亦为同一根源；毛公在此同一根源上作了删节修润的工作，以成今日所能看到的《诗序》。推《诗序》之所自来，一定说是出于子夏，本可启后人之疑。但在战国中期前后，孔门后学，集录孔门言《诗》者以为传，有如传《礼》，传《易》的情形，而为三家及毛诗所共同祖述，应当是合理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对三家诗既妄分门户，引刘向所著《新序》、《说苑》、《列女传》及其他文字引用及《诗》的，以属于《鲁诗》；又展转迁曲附会，以立《齐诗》，使与《韩诗》并立。一若其上更无共同的根据，实不可信。又，《召南·甘棠》：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卷一）

按此诗王先谦所谓“鲁说”、“齐说”，因征引者使用之便利，与《韩传》仅有文字之不同，内容则完全一致。《毛诗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毛传》：“召伯，姬姓，名奭，采于召，作上公，为二伯。后封于燕。此美其为伯之功，故言伯云。”《郑笺》：“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